

围城中的巨人

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

宋剑华 著



宋剑华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书出版获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

WEICHENG ZHONG DE JUREN — LIJIE LU XUN DE “JIMO” YU “BEI AI”

围城中的巨人

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

宋剑华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围城中的巨人：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宋剑华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5623 - 5472 - 7

I. ①围… II. ①宋… III. 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I 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5007 号

围城中的巨人——理解鲁迅的“寂寞”与“悲哀”

宋剑华 著

出 版 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王 磊

责任编辑：龙 辉

印 刷 者：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6.5 字数：296 千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悲哀”与“绝望”： 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代序)

毋庸置疑，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灵魂人物，其“无地彷徨”而“反抗绝望”的批判理性，早已被学界提升到了五四启蒙的思想高度，成为知识分子人格追求的精神偶像。综观几十年来国内学者的鲁迅研究，人们一直都在试图接近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说”还是“思想启蒙说”，客观上都存在一种“臆说”鲁迅的价值偏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大量引入，更是造就了鲁迅研究的空前“繁荣”，诸如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乃至复调理论的泛化使用，不仅使读者逐渐生疏了鲁迅，还使读者困惑地迷失了鲁迅——“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再加上“哲学家”的多重释义，厚重到严重阻隔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灵对话；尽管还原真实鲁迅的社会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可是因其话题过于敏感而每每受到强烈的斥责！聪明而睿智的鲁迅似乎很有先见之明，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一旦被奉为“伟人”，其身后必然要遭遇被人误解的尴尬处境，故他才会不无调侃地戏谑道：“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①鲁迅当然并不想成为“傀儡”，然而他却同所有“伟人”一样，最终只能被后人加以无限地“阐释”，自己则失去了回应辩解的“言说”能力。所以，超越作品文本去替鲁迅进行思想“言说”，这是国内鲁迅研究界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重新认识鲁迅与五四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去澄清真实“历史”与虚拟“历史”的本质区别。克罗齐曾强调说真实的“历史决不是用叙

^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6页。



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①如果我们按照克罗齐的说法来推论，鲁迅作品文本应是唯一性的历史“凭证”，只有它才具有研究鲁迅思想的真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其具体实践过程当中，“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个鲁迅”的众说纷纭，显然都呈现出了一种任意“肢解”鲁迅思想的怪诞现象。所以，一个被“言说”的鲁迅，也因“言说者”的主观意志，走出了历史而进入了神坛。

对于鲁迅及其作品超越文学意义的思想评价，归根结底应是源自瞿秋白与毛泽东这两位政治革命家的权威定论。早在1933年鲁迅在世之际，瞿秋白就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第一次将鲁迅的文学创作视为现代“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鲁迅也被他誉为“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最终完成了其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②的彻底转变。而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更是气势恢宏铿锵有力地论述道：

“五四”以后则不然。——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

不可否认，瞿秋白与毛泽东都是出自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诉求，去宏观地概括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鲁迅反封建思想启蒙的社会意

① [意]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第223页。

② 《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6、97、99、115页。

③ 该文最早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全文登载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



义；他们都急切地希望树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光辉榜样，以便最终确立无产阶级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鲁迅也因此被改变了其“文学家”的原初形象，成为具有“革命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时代“战士”！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富仁的思想革命“镜子说”与汪晖的反抗绝望“启蒙说”，虽然都力图摆脱鲁迅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潜在影响，但是他们从思想革命入手去重新“言说”鲁迅的种种努力，也同样因其受制于中国式启蒙理论的自我束缚，仍旧去人为地提升鲁迅及其作品在现代思想史的文化价值——所以，鲁迅并没有从当前学界那里获得精神人格的真正解放，他同样只能顶着“旗手”和“主将”这一辉煌而神圣的附加头衔，“孤独”与“寂寞”地“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①；这就恰恰有如他自己曾经嘲讽过的那样：“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②

将鲁迅视为“旗手”和“主将”，人们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回避一个历史问题：鲁迅并不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发难者，甚至于他在《新青年》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仍对这本杂志并无任何好感。比如周作人就曾回忆说：“那年四月（指1918年，引者注）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③周作人此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从1918年鲁迅日记的记载来看，的确有两次提到过他买《新青年》杂志送人。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鲁迅仍对“新文学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示出了颇有些不屑一顾的个人偏见，他在致宋崇义的信中这样写道：“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④鲁迅此话暗含讽义，他显然是认为《新青年》在崇尚“空谈”，故他才会鼓励那些青年学子去“熬苦求学”，做些“根柢学问”。但学界却对于这一历史真相做了匪夷所思的另类析解，而瞿秋白那番混淆视听的激情辩白，则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之声：鲁迅之所以很晚才加入《新青年》阵营，“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

①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② 《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6页。

③ 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67页。

④ 《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



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①瞿秋白此言的确是用心良苦，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强调说明：只有在鲁迅加入了《新青年》阵营之后，才能算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应该说几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鲁迅思想的价值判断，也基本上延续着早年瞿秋白的这一观点。故鲁迅成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那么将其视为时代的“旗手”与“主将”，也就是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铁定事实了。但鲁迅本人却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明确地指出：“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②其实，鲁迅这种胸襟坦荡自我解剖的类似语言，在他早期的杂文与小说中，都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我个人宁愿去相信鲁迅本人的真情诉说，而不愿去相信学界那些信口开河的杜撰之辞！

鲁迅坦承“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这恐怕并非鲁迅本人的自谦之词，而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因为在他看来“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但实际上则“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服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③。于是他终于感到了刻骨铭心的“寂寞”与“悲哀”。鲁迅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是我们研究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但就是在这篇仅有三千多字的叙述短文里，“寂寞”与“悲哀”竟出现15次之多。由此我们足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情绪是何等的消沉与低落！《〈呐喊〉自序》除了告诉人们作者当时的“颓唐”心境，同时还告诉人们作者与新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老朋友金心异”多次来访，“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故他开始“听将令”，并逐渐为《新青年》写文章。^④鲁迅受钱玄同等人的鼓励与催促，被动地加入《新青年》的启蒙阵营，这是具有历史依据的客观事实：我们通过检索1917年10月到1918年12月的鲁迅日记，总共统计出在这14个月期间，钱玄同单独到访过26次，

①《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3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5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1-292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419页。



刘半农单独到访过6次，钱与刘共同到访过5次。此外，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还同鲁迅饮酒2次，前后相加见面次数竟多达39次。仅就这一具体数字而言，鲁迅的确是盛情之下其实难却，“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因此也就“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①。

鲁迅因“听将令”而蹒跚着走入了“五四”，虽然他“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可是当他意识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②的社会现实时，却又深深地陷入了“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③的苦闷情绪。众所周知，小说《祝福》中“我”与祥林嫂那段精神对话，最能够反映出鲁迅本人的思想矛盾：就连“我”自己都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了无路可走，又怎能去给同样困惑的祥林嫂解答疑问呢？所以“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因为“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④——在寒冽空气中感受“孤独”与“寂寞”，这是导致五四时期鲁迅“颓唐”的根本原因！

二

五四时期鲁迅真实的精神状态，明显呈现出一种“亢奋”与“颓唐”的二元对立，过去人们也往往是通过《呐喊》和《彷徨》的字面意义，去直观地判断鲁迅对待思想启蒙的微妙变化，似乎鲁迅人格也构成了自我否定的内在矛盾，这明显是脱离历史“原场”的学界想象。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便可以发现，杂文的鲁迅与小说的鲁迅，始终都表现为一个“绝望”的鲁迅；而《热风》式的“战斗”“呐喊”，也一直都“彷徨”于凄凉的“坟”丘之侧，向读者诉说着“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的心灵悲哀。^⑤五四时期鲁迅所写的“战斗”杂文一共有四本，即《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恰好是四部，即《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与《野草》。高呼猛进的社会杂文与情绪低落的小说散文，的确会让人感到有鲁迅思想相互抵触的巨大困惑；但只要我

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③⑤《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3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们把“听将令”这一因素带进去，用杂文去“呐喊几声助助威”^①的真实意图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②。

“听将令”的客观事实，使我们必须去重新正视一个真实鲁迅的自我存在，因为杂文中的“亮色”终究无法遮蔽小说中的“隐晦”，而最终取代鲁迅那种挥之不去的绝望情绪。“救救孩子”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这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两大内容；但是“孩子”难救与“国民性”难改的小说叙事，无疑又使他回归到了“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理性思考！鲁迅为什么要将“热风”埋入“坟墓”而独守“孤独”呢？这恐怕并非一己之“热风”难以抵御四周之“寒冽”那么简单；而是鲁迅从其刚一加入《新青年》阵营开始，他就不相信思想启蒙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社会效用！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真实鲁迅的自我言说。

《随感录二十五》是鲁迅“听将令”后，较早为《新青年》所写的“战斗”檄文，这篇杂文以愤世嫉俗的悲凉之声，向全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呐喊。鲁迅在此文中写道：“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所以他呼吁人们要强化现代教育，关注孩子精神人格的健康成长，进而培养他们“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③。从此以后，这种进化论思想的“拯救”意识，便成了鲁迅杂文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④，“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⑤，如果“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⑥。故鲁迅鼓励社会与家庭的成年父辈，“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⑦甚至他还乐观地认为，“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⑧这些令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历来都被学界视为鲁迅启蒙思想的集中表现。殊不知鲁迅“呐喊几声助助威”的敷衍之说，只不过是he用来应付“主将”们“不主张消极的”搪塞之词！比《随感录二十五》早5个月刊登于《新青年》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个最为典型

①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5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6页。

④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3页。

⑤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9页。

⑥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

⑦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⑧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7页。



的例证。在《狂人日记》所给定的客观环境里，“狼子村”中那些被“娘老子”教坏了的成年父母，由于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潜在影响，他们露出“青面獠牙”的真相“想要吃我”，却并未使“狂人”感到内心世界的由衷恐惧；而真正使他感到惊悸与战栗的则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古久先生”之间结怨时，“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作者在这种貌似“疯癫”的叙事当中，为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屏障：假定“狼子村”就是喻指中国地理的历史版图，“古久先生”就是喻指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陈年流水簿”就是喻指传统文化的历史记载，那么“娘老子”几千年来的世代教诲，会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反抗呐喊，而使一种延绵不息的古老文明戛然终止了呢？“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终于明白了自身历史的厚重感与压抑感：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学界对于《狂人日记》这一结束语的看法，几乎都是从正面意义上去肯定其“救救孩子”的启蒙价值；但我个人却认为“问号”与“省略号”的连接使用，则是作者寓意着一种质疑启蒙的真实意图——理由十分简单，“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答案当然是“没有”！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文化母体所孕育出来的生命细胞，如果“吃人”已经被确定为是中华民族文化母体的遗传基因，那么中国人从他出生伊始便难逃其传承“吃人”文化的历史“厄运”！故我们不禁要发问：在“救救孩子”的后面，究竟被作者人为地省略掉了些什么？回答自然是“孩子可救吗”的信心丧失！从《狂人日记》中的“孩子”之难“救”，到《药》《明天》《祝福》中的“孩子”之“死亡”，无不反映着鲁迅“孩子不可救”的绝望情绪！肉体的“死亡”固然令人伤感，而精神的“死亡”则更令人悲哀。如《社戏》中那群顽皮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不是在《长明灯》里变“坏”，便会像《故乡》里的闰土那样变“迂”，这种“孺子不可教”的文化天性，恰恰是鲁迅“启蒙无效论”的思想基础！因此，“狂人”终于从“癫狂”中幡然醒悟，他不再幼稚地去热心“拯救”孩子，而是务实地回归到传统去等待“候补”，这就是《狂人日记》所要告诉读者的创作主题！

“改造国民性”与“救救孩子”密切相关，同样也是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思想精华，那些精妙绝伦、深刻无比的尖刻言辞，至今仍不失其振聋



发聩的“警世”作用。这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超乎常人的理性认识，他通过自身体验与细致观察，惊奇地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①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化犹如“无物之阵”，无论启蒙者怎样地挣扎与反抗，他们到头来都只能落败而归，最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②。虽然鲁迅不无悲哀地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③；但他仍旧振臂高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④鲁迅杂文这种抑扬顿挫的激情呐喊，以及他不屈不挠的“韧战”精神，当然不失为一种英勇无畏的“战士”姿态，然而这却是鲁迅自身所佯装出来的一种假象。五四时期鲁迅小说中对“国民性”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无奈”，则正是对其杂文中攻打“国民性”高昂士气的“解构”与“否定”；而杂文之鲁迅与小说之鲁迅看似矛盾的悖论现象，则又集中反映了他“绝望”大于“希望”的悲剧意识。应该说“启蒙无效论”是《呐喊》与《彷徨》的创作主题，也是鲁迅本人“寂寞”与“孤独”的五四姿态——从《狂人日记》中的“亢奋”情绪，到《离婚》中的“平静”叙事，我们发现“狂人”之辈的思想“癫狂”，最终遭到了“爱姑”之辈的无情狙击——启蒙者非“死”即“颓”的残酷命运，被启蒙者非“顽”即“愚”的精神面貌，其实就是鲁迅对于《新青年》阵营近乎哀鸣的善意忠告。聪明的“狂人”终于在“狼子村”村民的冷漠注视中，迅速觉醒并立刻恢复了他合乎逻辑的世俗常态；而执着的“夏瑜”却在众多看客的冷嘲热讽中，极其悲惨地成了“吃人”文化“筵宴”中的牺牲祭品！鲁迅并没有把“文化”看作一种虚拟形态的抽象理念，而是看作一种以普通国人为实际载体的形象符号；那么“夏瑜”去向民众宣传革命“造反”的启蒙道理，无疑也就等于是在“与虎谋皮”，这应是鲁迅小说批判理性的深刻之处。当然，鲁迅还为读者塑造了另外一种“过客”形象，但“过客”则更是令人沮丧的悲剧人格，或像吕纬甫

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2-216页。

②《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1页。



和魏连殳那样自我“堕落”，或像涓生与子君那样自我“颓唐”——无论是“堕落”或“颓唐”，鲁迅小说都没有给“过客”人物以光明的出路：“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①，只能去低徊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②的生命哀歌，并“于天上看见深渊”里的“墓碣文”，^③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沉重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

杂文的“希望”与小说的“绝望”，以两种不同方式的声音，向人们展示着一个五四时期的真实鲁迅：他用杂文的“热风”温暖着启蒙先驱者的孤寂心灵，同时又用小说的“冷酷”刺激着启蒙先驱者的敏感神经；但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启蒙者的屡遭“厄运”，实际上都是作者告诫《新青年》阵营不要盲目乐观的逆耳忠言！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绝不是什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④，而是与“狂人”曾经“吃”过妹妹的“肉”一样，也不过是“吃人”文化“排筵宴”的一个“帮手”。（原文为“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⑤。）这说明鲁迅早已认定他和“狂人”都失去了“拯救”他者的启蒙资格；所以“狂人”最后的猛然觉醒，也就意味着鲁迅对启蒙的彻底绝望！这种从“绝望”中无奈去“反抗”、但“反抗”了却依旧“绝望”的悲凉心境，不仅生动地反映了鲁迅自身“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批判理性，同时也使他超越了五四时代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启蒙精英，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历史巨人！

三

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彻底绝望，使鲁迅倍感“寂寞”与“悲哀”，并经常流露出一种“颓唐”的情绪，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只要我们认真去阅读一下《鲁迅全集》的第一卷《〈坟〉题记》《写在〈坟〉后面》《〈热风〉题记》以及《〈呐喊〉自序》等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几乎都是在

①《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②《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③《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

⑤《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4页。



使用格调低沉的总结性文字，毫不掩饰地向读者敞开着自已极度苦闷的心灵大门——面对那些“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的西方作家，可“他们的名”却在“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①；他还十分坦率地告诉广大读者，“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②。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这正是我所悲哀的”^③。所以他只能“麻醉自己的灵魂”，“沉入于国民中”与“回到古代去”，“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④

“苦涩”与“灰色”的伤感情绪，虽然与高呼猛进的时代氛围不太协调，但却深刻地反映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爱恨交织，以及他对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无序状态的忧患焦虑：传统文化那种超强大的情性力量，绝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变；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启蒙言说，也难以唤醒黑暗“铁屋子”里鼾声如雷的沉睡国民！因为“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相似”。^⑤这种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的批判理性，恰恰是支撑着鲁迅“反启蒙”思想的力量源泉。

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生命体验，无疑使他产生了一种异常绝望的复杂心情，他说：“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⑥在这种文化“围城”当中，“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⑦。正是由于鲁迅意识到了“时势虽然变迁”，但中国古老文化却“是不会失掉的”缘故，所以他才无可奈何地反讽道，“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⑧不仅

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页。

⑤《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9页。

⑥《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⑦《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⑧《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



启蒙者是如此，被启蒙者更是如此。故他认为“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会被中国文化所彻底地“同化”掉。^①故鲁迅从不把自己比作指引国人的思想“导师”，且也从不主张先驱者以牺牲生命为启蒙代价，在他看来，“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②。因为“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③。这使我们自然会联想到鲁迅小说里的两种场景——一种是《阿Q正传》中阿Q“革命”时的得意神气：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鲁迅将阿Q与假洋鬼子之辈从讨厌“革命”到拥护“革命”视为“国民性”历史痼疾的同一性结构进行历史揭秘，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去揭示中国人在时代变革面前，尽可能地把“革命”变成于己“有利”的“务实”心态——因此，“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剪掉了辫子的假洋鬼子与盘起了辫子的阿Q等人，他们都顺应着时代变革的历史潮流，完成了国民自我想象中的“现代”转型，这无疑是鲁迅对于启蒙功效的潜在否定。另外一种是在《药》中华老栓等看客围观“杀人”时的冷漠表情：

一阵脚步声，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①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7页。

③ 《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革命启蒙者夏瑜正是在被启蒙者那麻木神情的注视之下，成了满足国民嗜血心理与“散胙”欲望的无谓牺牲者——华老栓“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由实用功利主义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使鲁迅直接将愚昧的民众视为“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他甚至还神情黯然地喟叹道，如果启蒙者不得不背负着这群“庸众”去艰难前行，那么中国“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①。

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悲哀”与“绝望”，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启蒙对象的空前绝望，“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启蒙主体的缺乏信心，“哀莫大于心死”，而“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③可仔细分辨“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④。鲁迅对于启蒙者身份的强烈质疑，在其散文《藤野先生》的卷首开篇，就已经意思清楚地表露了出来：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鲁迅以其轻松幽默的诙谐语调，生动地描绘了一群留日学生的逼真丑态；那么其他地方的留学生，情形又会是“如何呢？”鲁迅本人虽然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但我们只要联想到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留学生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体，其精神面貌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由于鲁迅有过出

①《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3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

③《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洋留学的切身经历，他才对那些启蒙主体有着比国人更为透彻的理性认识。比如他不无鄙夷地嘲讽说：“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张三；研究萧伯纳，威尔士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之类。……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纳，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①对洋人讲“国学”而对国人讲“西学”，启蒙者这种文化交流的奇特方式，造就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②，而启蒙者也“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③。为此鲁迅向社会厉声发问道：“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④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自省意识！众所周知，通过外国文学去了解西方文化，这是五四启蒙的流行做法。但鲁迅（甚至包括他后来的论敌梁实秋）却始终坚持认为，在那时外国文学根本就没有被真正地引进来，至多不过是些只言片语的肤浅介绍，连部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都没有翻译。“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⑤可见西方“启蒙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已经是一个存有争议的历史悬念。鲁迅这种看似偏激实为深沉的责难之说，提醒我们必须去重新正视小说《伤逝》的创作动机：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固然控诉了传统势力的精神虐杀，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启蒙的荒谬逻辑——作为五四启蒙的中心话语，“恋爱自由”是以西方文化的外来因素，构成了“破屋里渐渐充满”欢歌笑语的生命活力；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等西方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俨然一幅思想启蒙的动人场景！然而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学界迄今为止仍无人注意到鲁迅《伤逝》的否定意识——用西方文学去直接替代西方文化，已经是属于思想启蒙者的幼稚无知了；而涓生则又能无师自通地去大谈西方文学，则更是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方夜谭！鲁迅从不相信缺少现代人类文明意识的思想启蒙，能够真正改变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落后面貌，“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

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5页。

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8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

⑤《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8页。



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①他也从不相信深受“染缸”文化历史熏陶的国民“导师”，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成为登高一呼的救世“英雄”。“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②《伤逝》只不过是以中国古代文学“私奔”现象的现代演绎，全面揭穿了五四时期“恋爱自由”启蒙话语的“西化”假象，这就有如《狂人日记》中那个只能折射太阳光线的“月亮”寓意，自己不发光自然也就难以给黑暗世界带来光明！

五四时期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名言：“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③正是由于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所以他才主张不要轻易地去打扰黑暗“铁屋子”里的沉睡国民；否则“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那对他们无疑就是一种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④故我们必须去正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鲁迅让启蒙者“狂人”终止了“癫狂”，并反复告诫许广平“小鬼不要变成狂人”，这一切都表明了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阴柔”特性，^⑤不仅充满恐惧而且深感绝望！与此同时，“听将令”也并没有因为鲁迅的“呐喊”与“反抗”，而使其彻底摆脱“寂寞”与“孤独”的“颓唐”情绪——从他踏入《新青年》阵营便使“狂人”破灭了启蒙理想，到20世纪20年代末自己也坦然地面对了现实。鲁迅正是以其对于我们古老民族的复杂情感，形象地演绎了他和“狂人”一样“绝望”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认为“狂人”就是鲁迅，而“狂人”的绝望也就是鲁迅的绝望；“绝望”即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同时也是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

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③《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160页。

⑤《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8页。